

古與今 詩歌研究 叢刊

賀程
印

第十四輯 第三冊

李煜詞接受史（下）

黃思萍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四輯

龔鵬程 主編

第3冊

李煜詞接受史(下)

黃思萍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李煜詞接受史（下）／黃思萍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102〕

目 4+226 頁；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四輯；第3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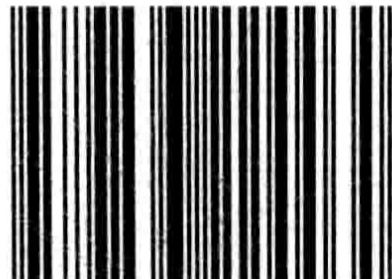
ISBN 978-986-322-446-4（精裝）

1. 五代李煜 2. 唐五代詞 3. 詞論

820.91

102014964

ISBN-978-986-322-446-4



9 789863 224464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四輯 第三冊

ISBN：978-986-322-446-4

李煜詞接受史（下）

作 者 黃思萍

主 編 巍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年9月

定 價 第十四輯 17 冊（精裝）新台幣 24,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李煜詞接受史（下）

黃思萍 著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目的	3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概述	4
一、李煜詞研究概況	4
二、文學接受研究概況	9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5
一、理論述要	15
二、文獻取材	17
三、研究架構	26
第二章 李煜詞宋代接受史	29
第一節 期待視野——時代背景與詞壇風氣	29
一、時代背景	29
二、詞壇風氣	35
第二節 接受之具體呈現——詞話、詞論	45

一、對李煜詞本事之探究	45
二、對李煜言行之批評	52
三、對李煜詞藝術價值之讚賞	55
第三節 接受之具體呈現——詞選	64
一、選錄情形	66
二、分見各本概況	67
第四節 接受之具體呈現——再創作	75
一、和韻	75
二、仿擬	78
三、櫽括	79
四、襲用成句	82
第五節 小結	85
第三章 李煜詞明代接受史	87
第一節 期待視野——時代背景與詞壇風氣	87
一、時代背景	87
二、詞壇風氣	92
第二節 接受之具體呈現——詞話、詞論	106
一、對李煜詞本事之探究	107
二、對李煜詞整體風格與詞史地位之推崇	109
三、對李煜詞藝術價值之讚賞	113
四、並列比較李煜和他人之言行或作品	124
第三節 接受之具體呈現——詞選、詞譜	127
一、選錄情形	127
二、分見各本概況	128
第四節 接受之具體呈現——再創作	142
一、和韻	142
二、集句	145
第五節 小結	146

下冊

第四章 李煜詞清代接受史	149
第一節 期待視野——時代背景與詞壇風氣	149
一、時代背景	149

二、詞壇風氣	155
第二節 接受之具體呈現——詞話、詞論	188
一、對李煜詞本事之探究	190
二、對李煜言行之批判	202
三、李煜詞之詞史定位與風格歸屬	204
四、對李煜詞藝術價值之評論	212
五、並列比較李煜和他人之言行或作品	234
第三節 接受之具體呈現——詞選、詞譜	242
一、選錄情形	242
二、分見各本概況	243
第四節 接受之具體呈現——再創作	271
一、和韻	271
二、仿擬	290
三、集句	292
第五節 小 結	298
第五章 結 論	301
一、歷代「詞話、詞論」之接受	301
二、歷代「詞選、詞譜」之接受	303
三、歷代「再創作」之接受	307
參考文獻	309
附 錄	
附錄一：大陸 2006 年～2011 年研究李煜詞 之期刊論文	325
附錄二：李煜詞 38 首	344
附錄三：李煜詞存疑詞考辨表	358
附錄四：「表 2-1 李煜詞見錄宋代選本統計 表」	365
附錄五：「表 3-1 李煜詞見錄明代選本統計 表」	367
附錄六：「表 4-1 李煜詞見錄清代選本統計 表」	368
附錄七：「表 5-1 李煜詞見錄歷代選本一覽 表」	369

第四章 李煜詞清代接受史

第一節 期待視野——時代背景與詞壇風氣

一、時代背景

在中國歷史上，清代與元代皆為非漢族所統治的朝代，一為女真族，一為蒙古族，入主中原時，也都激起漢人強烈的反抗。何以宋元之際的詞作熱潮無法延續，以致曲代詞興，而明清之際的詞潮卻能流貫整個清代，使得詞派迭出、詞作繁盛、詞學理論發展卓越呢？這和清代統治者的鎮壓兼懷柔、恩威並施的政策密切相關，種種政策措施，使明末遺民將國仇家恨的悲慨之情，寄於婉曲的詞中；又影響到學術思想方面，考據學嚴謹的治學態度以及理論方法，擴展應用到經學、史學、文學等研究領域，詞壇自然也不例外。茲分「政治社會」與「學術思想」兩個層面，探討塑造詞人期待視野的背景因素。

（一）政治社會

清代與元代統治高層極為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尊重漢文化，漢化程度也較高。元代對漢人進行的只有武力壓制，並強分人種為四個階級，鄙視漢人，九儒十丐，又廢除科舉，讓文人失去某種生命志趣的寄託和實現抱負的機會，因此漢、蒙間的民族對立始終未曾消解，實

是造成元代國祚短促、暴起暴落的主因之一。清代統治者把握到這個關鍵點，入關前即起用大批漢族官吏，為其喉舌，並充當監視逆反異端、箝制言論的幫手。雖然滿清入關之初，採取的是游牧民族馬上得天下的殘酷鎮壓手段，血淋淋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還有順治朝示威懾人的科場案、奏銷案、通海案等，為鞏固統治權、掃除反滿異端，不僅屠殺各地武裝反抗份子，也十分留意士子與鄉紳思想上的動亂，尤以江南一帶受到最為嚴厲的懲飭，藉由打壓菁英輩出、財大勢大的江、浙兩省士紳，來殺雞儆猴。^{〔註1〕}不過，到了康熙朝，統治勢力已然穩固，英明的皇帝體認到僅用殘酷的軍事殺戮與嚴密的思想文網等高壓手段，並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也無法消弭滿漢對立的仇恨情緒，因此展開懷柔政策，試圖讓漢人士子打從內心歸順，如舉薦山林隱逸之明代遺老、開博學鴻儒科，詔舉名望傑出的士人，如朱彝尊、毛奇齡等，以籠絡人心，並令這批士人纂修明史。深懷故國之思的明遺民，修史必當竭盡全力，還會對清王朝的厚愛隆恩感激在心，如此清廷既能消耗人們的體力和精神，使其無暇再興反叛之心，更可輕鬆達到掌控漢人首腦的目的，可謂一箭雙鵰。乾隆朝欽定編纂《四庫全書》，也有同樣的用意。

從滿清入關到康熙朝，明遺民不管出仕清廷與否，時代動盪之驚懼、家國滅亡之沉痛、忠與不忠之掙扎以及在新朝廷上動輒得咎的悲哀，皆構成士人心靈上普遍的情緒基調，極度需要找到可以宣洩的文字載體，於是詞體的復興機緣到來。詞這種傳統上一直被視為小道末技，主要用於倚紅偎翠、淺斟低唱的場合，風格多半婉媚香豔的抒情體裁，最適合躲過嚴密的文網監控，讓士人藉著隱曲幽微的表達方式，一吐心中不平之鳴。從目前清代還未有因詞作被牽連入獄的紀錄觀之，^{〔註2〕}對漢文化認識不盡全面、不夠深刻的清廷，關注的顯然

〔註1〕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頁7～9、145～149。

〔註2〕 謝桃坊：《中國詞學史》（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12月），頁261。

只有詩、文這些傳統上明確用來言志的文體，而不認為詞也具有這方面的功能。漢族士人得以在清廷不諳詞體隱微言志功能的忽略之下，填詞抒發心聲，如曹爾堪、王士祿、宋琬等人主導的江村唱和、紅橋唱和、秋水軒唱和，〔註3〕得到南北眾多文士響應，借題發揮，以澆胸中塊壘，即是利用詞婉曲的特性，不若詩的直露，故能隱微地寄託感慨。清詞之創作便這般興盛起來。

另一方面，由康熙帝親自主持的《御定詞譜》與《歷代詩餘》兩部詞籍鉅著，對詞風的推動之功不容忽視。當中特別的是，身為滿人的康熙帝對詞體並無漢族一貫的小道之見，認為「詩餘之作，蓋自昔樂府之遺音，而後人之審音選調，所由以緣起也。」〔註4〕並將詞之起源與遠古唐虞詩樂教化的傳統聯繫起來，謂「可見唐虞時即有詩，而詩必諧於聲，是近代倚聲之詞，其理固已寓焉」〔註5〕、「詞者，繼響夫詩者也」〔註6〕。君王的認可和提倡，對詞的尊體作用影響甚大。〔註7〕

康熙朝到乾隆朝是清代的巔峰期，太平盛世背後，滿清對漢人的防範並無鬆懈，從其大興文字獄使朝野風聲鶴唳可知。此時以朱彝尊為領袖的浙西詞派很巧妙地適應了清廷的文化政策，標榜南宋姜夔、張炎一派清空的詞風，並提出雅正的宗旨。此派的宗旨讓漢族文人在隱曲地藉由用典、詠物等技巧來表達複雜、深沉的情感之餘，不僅不會對統治者構成威脅，還有助社會禮教，很能符合統治者的喜好，也為自身發展爭取到極為有利的條件，〔註8〕故不若以陳維崧為領袖的

〔註3〕 嚴迪昌：《清詞史》，頁51、127。

〔註4〕 清·清聖祖：〈歷代詩餘序〉，見錄於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12月），卷9，頁758。

〔註5〕 清·清聖祖：〈歷代詩餘序〉，見錄於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卷9，頁758。

〔註6〕 清·清聖祖：〈歷代詩餘序〉，見錄於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卷9，頁758。

〔註7〕 嚴迪昌：《清詞史》，頁204～207。

〔註8〕 孫克強：《清代詞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7月），

陽羨詞派，雖然稍早於浙西詞派登上詞壇，卻因崇尚蘇軾、辛棄疾一派豪放悲壯之風，不合昇平時宜，聲勢維持沒有多久便消散了。

嘉慶朝以降，清王朝由盛轉衰，腐朽的現象日益浮出檯面，兼之內憂外患頻仍，浙派末流的弊端也顯露無遺，過度追求醇雅的外貌、講究形式音律而缺乏真情實感和思想內涵的困境，已然不適合積鬱社會的需求，使其詞壇盟主的地位被以張惠言為領袖的常州詞派所取代。張惠言有今文經學派的背景，於詞中發揮經世致用、微言大義等理論，強調比興寄託，又將對《周易》的研究體會帶入詞中，主張意內言外，周濟進一步提出「詩有史，詞亦有史」^(註9)，認為詞有紀錄社會現實的功能，「感慨所寄，不過盛衰」^(註10)無疑是順應時勢的。常州詞派自此籠罩詞壇到清末。晚清四大家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皆源出常州詞派，於道光、咸豐間接棒，對常州派理論有所繼承，又各有創新進展，如況周頤贊同比興寄託，卻也革新了寄託之含意，謂「詞貴有寄託，所貴者流露於不自知，觸發於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於性靈。即性靈，即寄託，非二物相比附也」^(註11)、「吾為詞而所寄託者出焉，非因寄託而為是詞也」^(註12)，強調情感真實即能自然流露，發而為詞，反對為了寄託去刻意造假，這就比張惠言流於牽強附會的寄託說更貼合時況了。面對清末動盪局面、國勢衰頹，列強不斷入侵，中國遭蠶食瓜分，卻無招架之力，任憑宰割，人民水深火熱，四大家感觸尤多。他們和清代多數兼顧治經、史的詞家不同，幾乎投注畢生精力治詞，並以詞作為抒發國仇家難與個人悲

頁 180。

(註9) 清·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見錄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1月），冊2，頁1630。

(註10) 清·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見錄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2，頁1630。

(註11) 清·況周頤：《蕙風詞話》，見錄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5，頁4526。

(註12) 清·況周頤：〈詞學講義〉，見錄於龍沐勛編輯：《詞學季刊·創刊號》（上海：民智書局，1933年4月），頁109。

憤的主要載體，而多所建樹。

（二）學術思想

歷經甲申之變亡國劇痛的明末清初三大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有鑑於宋明理學空談心性義理、不切實際之弊，尤其是明代中葉以來陽明心學「心即理」所造成的人心散漫、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如黃宗羲云「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基，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註13〕}，是以他們重申讀書、考察與實證之必要，治學態度皆尚樸實，熔經、史於一爐，強調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的精神，遂開啓清代考據學無徵不信之務實風氣。三大家省思明朝覆亡之因，博覽群書，企圖從古往今來的歷史中，歸結出治亂興衰的所以然，顧炎武曾謂「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註14〕}，他們不囿於孔孟儒學，而是以經學爲主，旁通百家之學，於經學、史學、小學、音韻、天文曆算、水利、地理、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佚等學術領域均有涉獵，獲得不少研究心得，著述豐富，如若僅就顧炎武畢生著作當中著名者觀之，則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音學五書》等，涵蓋領域已然甚廣。^{〔註15〕}考據學嚴謹的治學態度與博學致用的務實思想，由三大家紮下基礎，到了康熙朝與乾隆朝編纂《明史》和《四庫全書》時，更起到推波助瀾之效。不僅

〔註13〕此段文字出自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乃全祖望轉述黃宗羲之語，原文爲：公（指黃宗羲）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基，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見錄於清·全祖望：《鮚埼亭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3月），上冊，頁136。

〔註14〕清·顧炎武：《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初刻日知錄自序》（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4月），頁7。

〔註15〕林啓彥：《中國學術思想史》（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1月），頁242～259。

統治者樂見漢族士人致力編修大型史書、叢書，削弱其反叛意念，清代學者也個個博學多識、治學精湛，集經學家、史學家等多方專長於一身。

可以說，清代士人主要的身分是學者，影響到詞壇上，使得詞學理論發展卓越，詞派自我意識清楚，並於蒐羅佚書、編輯詞選、校勘詞籍、考訂音韻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與優秀成果，對清詞的中興裨益良多。

若說清初到康雍乾盛世之間，在統治者箝制思想的環境約束下，學者所發揚的主要三大家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治學態度，如清初的浙東學派中，古文經學佔主流地位，注重名物訓詁、考訂史實。在詞壇上則有萬樹的《詞律》，可作為嚴謹治學態度之代表。那麼，從嘉慶、道光朝開始，因王朝內憂外患接踵而來，三大家經世致用、有補於世的務實思想，逐漸受到重用與實現，今文經學派遂取代古文經學派的地位，直到清末。若論將經世致用的思想運用於詞壇者，則張惠言的微言大義、比興寄託是最明顯的例子。常州詞派與常州學派淵源甚深，而常州學派的主流是今文經學，尤其是公羊派經學，強調治經是為現實政治服務，在治學方法上以微言大義來解經。^(註 16) 張惠言原為古文經學家，卻也因應時代社會需要以及學術思潮演變，由治《周易》涉足今文經學領域，其弟子宋翔鳳、劉逢祿皆為今文經學家，常州詞派後起之秀譚獻、莊棫亦精通經學，注重微言大義。他們評論詞句、解析詞意都運用錘幽鑿險之法來探求微言大義，如宋翔鳳評述張惠言治詞之法：「先生（指張惠言）於學皆有源流，至於填詞，自得宗旨。其於古人之詞，必錘幽鑿險，求義理之所安，若討河源於積石之上，若推經度於辰極之表。其自為詞也，必窮比興之體類，宅章句於性情，蓋聖於詞者也。」^(註 17) 張惠言運用此套思路，以比興寄

[註 16] 嚴迪昌：《清詞史》，頁 467。

[註 17] 清·宋翔鳳：〈香草詞自序〉，見錄於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卷 7，頁 578。

託解詞，常割裂詞句，強作附會，如對溫庭筠詞重新評價，稱揚「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閟約」〔註 18〕，更謂其〈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當中的「照花」四句有「離騷初服之意」，〔註 19〕以溫庭筠比屈原，可謂前所未有的驚世駭俗之見。後來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亦承張惠言之見，認為「飛卿詞全祖《離騷》，所以獨絕千古」〔註 20〕。而周濟與譚獻對比興寄託說有所推展，分別提出「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註 21〕、「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註 22〕，竟與現代的讀者接受理論可相參合，這真是以經學之義理方法治詞學，所始料未及的發展了。

綜上觀之，影響清代詞人期待視野的最大因素是政治社會的變遷，學術思想則是因應不同階段政治社會環境，所衍生出來的第二層關鍵。時代的風雲際會與詞人各自的性情遭遇交互作用，正如各階段時代背景所呈現出的分明的環境需求，詞壇風氣從清初到清末，亦可用詞學流派各自的主張特色、盛衰情況統攝之。

二、詞壇風氣

種種因緣際會，使詞體於清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與發揮，更和各時期政治社會的治亂盛衰息息相關。從清初到清末，各個詞派以其鮮明的理論宗旨和審美觀點來樹立旗幟，達到號召詞壇、獨領風騷的效果，且其聲勢、影響力幾乎是一波緊連著一波、無中斷的此派消散

〔註 18〕清·張惠言：〈詞選序〉，見錄於施蛰存主編：《詞籍序跋草編》，卷 9，頁 796。

〔註 19〕清·張惠言：《詞選》，見錄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2，頁 1609。

〔註 20〕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見錄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4，頁 3777。

〔註 21〕清·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見錄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2，頁 1630。

〔註 22〕清·譚獻：《復堂詞話》，見錄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4，頁 3987。

則彼派繼起。正如孫克強《清代詞學》一書所說：

清代的詞學流派貫穿於整個清朝始終，可以說清代的詞學史即是一部流派史。^{〔註23〕}

清代詞學自始至終和時代脈動關係密不可分，清代的詞學史即是一部流派史，故要知曉清代詞壇風氣，對李煜詞的清代讀者論世知人一番，非得由詞學流派入手不可。以下就清初至清末的五大詞派，依序探討之。

(一) 雲間詞派

此派的地域中心在雲間（江蘇松江），其領袖為明末之陳子龍，他與李雯、宋徵輿並稱「雲間三子」。代表詞集為《幽蘭草》，乃三子詞作之合編。此派為由明入清的關鍵，承先啓後，影響力大且深遠。陳子龍的對詞的審美觀點，乃崇尚南唐、北宋的婉麗流暢、元音高渾，如其〈幽蘭草詞序〉云：「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穠纖婉麗，極哀豔之情；或流暢澹逸，窮盼倩之趣。然皆境絲情生，辭隨意啓，天機偶發，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渾，斯為最盛也。南渡以還，此聲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於愴武；諧俗者鄙淺而入於優伶，以視周、李諸君，即有鄙都人士之嘆。」^{〔註24〕}這也是陳子龍有鑑於明代一味崇拜花、草之風，而使詞格委靡、詞風低俗日下，所提出的振興宗旨。為補救花、草弊病，強調回歸南唐北宋「繁促之中，尚存高渾」的氣象格局，「高渾」乃其對詞的最高理想。所舉出的南唐二主以及北宋周邦彥、李清照，無疑是他心目中詞家的典範。值得注意的是，陳子龍對靖康之難後的南宋詞，一律持否定態度，「南渡以還，此聲遂渺」認為南宋詞不是「亢率近於愴武」，就是「鄙淺而入於優伶」，無可取者。這是其詞學觀較為偏頗侷限之處。陳子龍獨尊南唐北宋，以矯正明代詞風衰頹之論，對清代詞壇造成的影響

〔註23〕 孫克強：《清代詞學》，頁21。

〔註24〕 明·陳子龍：《安雅堂稿》（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年9月），卷5，頁3。

有二：一是激發陽羨詞派與浙西詞派對明詞纖弱、俗濫積習的反動，轉而各尚蘇、辛的雄壯悲涼與姜、張的清空醇雅。二是確立詞派的自我意識，編選具代表意義的詞集、詞選本，有較為清晰一致的審美主張與審美傾向，不僅使雲間支流四派明確地用同邑、聲氣相投作號召，更對後來領導詞壇百餘年的浙西、常州詞派起到絕佳的模範作用。（註25）

接著，簡述雲間詞派在清初所衍生出來的支流——西冷、柳洲、毗陵、廣陵四詞派。此四派的詞學觀點，雖仍多受明詞主流審美觀與陳子龍的影響，卻也同中求異，有所革新：

1. 西冷詞派（又稱西陵詞派）

此派的地域中心在西冷（浙江杭州），主要詞人有毛先舒、沈謙、丁澎、陸圻、柴紹炳、吳百朋、陳廷會、孫治、張綱孫、虞黃昊，號稱「西冷十子」，代表詞集為《西陵詞選》。此派的詞學觀點深受陳子龍影響，如沈謙《填詞雜說》謂：「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註26〕，又云：「白描不可近俗，修飾不得太文，生香真色，在離即之間」〔註27〕，皆可見其與陳子龍「推崇金陵二主以及北宋周邦彥、李清照等人，欲以南唐北宋高渾之氣格，來調整明代俗弱缺失」的觀點相一致。另外，從沈謙和毛先舒兩人間頻繁往還的書信內容裡，亦可得知此派理念，如沈謙〈答毛稚黃論填詞書〉云：

至於填詞，……僕意旨所好，不外周、柳、秦、黃、南唐李主、易安、同叔，俱所願學，……六朝君臣，賡色頌酒，朝雲龍笛，玉樹後庭，厥惟濫觴，流風不泯。迨後三唐繼作，此調為多。飛卿新製，號約《金荃》；崇祚《花間》，

〔註25〕 孫克強：《清代詞學》，頁125～126。

〔註26〕 清·沈謙：《填詞雜說》，見錄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1，頁631。

〔註27〕 清·沈謙：《填詞雜說》，見錄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1，頁629。

大都情語。豔體之尚，由來已久。奚俟成都、太倉，始分上次。及夫盛宋，美成就官考譜，七郎奉旨填詞，徑闢岐分，不無闌入。甚至燔柴夙駕，慶年頌治，下及退閒高咏，登眺狂歌，無不尋聲按字，雜然交作。此爲詞之變調，非詞之正宗也。至夫蘇、辛壯采，吞跨一世，何得非佳？然方之周、柳諸君，不無偷父。而大江一詞，當時已有關西之諷，後山又云：「正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小吏不諱於面譏，本朝早定其月旦。秦七雅詞，多屬婉媚，即東坡亦推爲「今之詞手」。他如子野「秋千」、子京「紅杏」，一時傳誦，豈皆激厲爲工，奧博稱絕哉。^{〔註 28〕}

「六朝君臣，賡色頌酒」、「厥惟濫觴，流風不泯」點出詞體起源於六朝，此其風格綺麗之歷史淵源。沈謙承襲明代觀念，認爲溫庭筠、周邦彥、柳永、秦觀、張先、宋祁一類婉媚之作，方屬詞之正宗本色。對於蘇、辛壯采之作，視爲變調，並非不佳，只是比之周、柳諸君，不無偷父。因此，沈謙心目中仍以婉麗爲宗尚。

然而毛先舒對沈謙之說並不贊同，其〈與沈去矜論填詞書〉云：
詞句參差，本便旖旎。然雄放磊落，亦屬偉觀。成都、太倉稍臚上次，而足下持厥成言，又益增峻。遂使〈大江東去〉，竟爲逋客；三逕初成，沒齒長竄。揆之通方，酷未昭晰。借云詞本卑格，調宜冶唱，則等是以降，更有時曲。今南北九宮，猶多鼙鐸之音。況古創茲體，原無定畫。何必抑彼南轍，同還北轍，抽兒女之狎衷，頓壯士之憤薄哉。^{〔註 29〕}

這段言論展現了毛先舒宏通的風格取向。雖然旖旎爲長短句原本擅長之韻味，但是「雄放磊落，亦屬偉觀」，肯定豪放詞的價值，爲之辯

〔註 28〕 清·沈謙：《東江集鈔·答毛稚黃論填詞書》（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1997 年 6 月），集部，冊 195，頁 244 ~245。

〔註 29〕 清·毛先舒：〈與沈去矜論填詞書〉，此則爲清·王又華：《古今詞論》引，見錄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1，頁 610。